

余玩先集

选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寅初选集

徐汤莘 朱正直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马寅初选集

徐汤莘 朱正直 编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 15,125印张 3插页 321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ISBN 7-201-00110-8/C·21

定 价: 7.25元



马寅初像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以及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本丛书是由中国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编辑的。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为积累文化、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

编者前言

马寅初的一生，是饱经风霜、历尽坎坷、追求光明、坚持真理的一生。他的百年阅历，正是我国真正爱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典型缩影。在政治上，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舌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是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民主战士。在反帝反官僚资本的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和靠近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又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建国以后，他继续跟党走，为党出谋划策，献逆耳忠言，成为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诤友。在学术上，他向来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在建国前的许多著述，是对旧中国经济情况和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的重要记录，虽然有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不失为研究我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份可贵资料；建国后的论著，大部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研究的成果，见地新颖，贡献突出。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60多年，桃李满天下，学子遍布海内外，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

马寅初一生的专著、文章、讲话很多，见诸报刊杂志的就有600余篇，由于过去艰苦的环境和坎坷的经历，许多珍贵的手

稿资料都未保存下来。收入本选集的57篇，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收入选集的文章，都保持原貌，只对排印中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断句作了必要的改正和补充。文章一般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5月10日

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立场

马寅初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跨越一个世纪，是一位历经坎坷，可歌可泣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和教育界多次激起强烈的反响。在旧中国，他不仅是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而且是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全国解放后，人们称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袖；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称颂他是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广大青年一直把马寅初看作自己的良师和益友。在他逝世五周年的前夕，国内已有三部长篇的《马寅初传》问世。记述马寅初坎坷的经历和战斗的一生，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诤友，是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是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他一生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和学术活动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的小作坊主家庭。1898年进入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1902年中学毕业后，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被录取公费留学美国。他目睹美国的强大，联想祖国当时的社会腐败，经济落后的状况，意识到要使实业救国能够实现，就必须在社会管理制度上来一番改革。于是，第二年

他由学工科改学经济专业。在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之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因国内政治影响，公费取消，他只得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利用晚间和休息日，到码头扛木头，做苦工，到饭馆洗盘子挣钱来维持，生活极其艰苦。这时，多亏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财政学者赛利格曼教授伸出援助之手，才使他能集中精力专心攻读，1914年用英文写成《纽约市的财政》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5年，马寅初谢绝了指导教师留他任教的邀请，满怀着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富国强民的抱负，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

开始，他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随即发现他学的那套财政学说，在这里毫无用处。“官场习俗，非我所愿”。马寅初遂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毅然到北京大学担任了经济学教授，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1919年，马寅初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他积极协助校长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以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改革北大的封建教育制度。1920年1月，马寅初为了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辞去了教务长，专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执教十多年中，先后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等应用经济学的课程。

20年代，马寅初在北大任教期间，还经常到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经济，同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和中国银行总司券。同财政金融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对中国财政金融情况有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创造了条件。当时，我国学经济学的人很少，大厚本的经济学书籍读者更少，因此，马寅初就以演讲、发表短文的方式，广

泛介绍经济学知识，评论现实的经济问题。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200多次，对诸如农业问题、工商问题、劳资问题，国际贸易与关税问题、财政与信用问题、银行与货币问题、外国汇兑和一般的经济、财政学原理都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些演讲虽然谈的经济问题，却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这些演讲词汇集成册，就是当时风行全国的《马寅初演讲集》（共4卷本）。它对于人们了解20年代的经济情况，研究当时的经济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个时期，马寅初还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大量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论述了各种银行业务，如存款、放款、贴现、押汇、期票买卖、票据交换、发行钞票等，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时的著作，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起过积极的作用。

此时，马寅初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非议颇多，其代表作有《马克思学说与李斯特学说熟宜于中国》、《马克思学说在中国有实行之可能否？》、《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等等。他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宣扬主观价值论，他认为价值的发生不完全在于劳动，“而在吾人之脑中”。他还认为，“中国之患不在资本主义，而患在资本不足”，所以喊出了“资本神圣”的错误口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割据东北、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撤销北京大学。马寅初只好离任。

这时，公开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和在财政金融上求助于江浙财团，于1928年将马寅初请去任立法委员。1929年，让马寅初出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两三年后，又让

马寅初到经济委员会任委员长。马寅初这时实际上成了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在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马寅初任职期间，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官僚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有着深刻的矛盾。在立法院内，马寅初始终保持了发表个人见解的自由。他刚直不阿，秉公办事，据理力争，不管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孔祥熙当财政部长，他都不向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屈服，甚至在一次立法院的会议上，当面质问孔祥熙说：为什么在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时，不去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汇价，造成物价大混乱，物价更上涨？问得这位财政部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马寅初和宋、孔的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惹恼了国民党当局。1935年1月29日，南京《中国日报》就发表社论，不点名地指责马寅初的言行不符合“党国利益”，是不懂得“政治责任和公私分际”。马寅初随即在2月3日《武汉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指出“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并进而揭露财政部受某多头大投机公司所操纵，“这家大投机公司是专以公债券为经营对象的。”马文发表不久，1935年2月26日，财政部“某要员”就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谎称马寅初揭露财政部的黑幕是“有意诬蔑”。马寅初与当局的斗争，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期间，马寅初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爆发，马寅初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立即投入抗日行列。1931年11月，他为《交大抗日

特刊》写序文呼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要立即武力抵抗，要经济绝交。要不然，“他日虽欲抵抗绝交不可得也。”他认为要挫强暴、图生存，经济绝交不能只是消极地不买日货，而要积极地致力于生产；武力抵抗不能仅赖于百万将士，而要全国总动员。1932年，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马寅初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发表了《长期抗战之准备》一文。后又发表演说指出，“只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抵抗外夷，区区敌国，不足惧也”。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1923年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学群众学术性团体，马寅初长期担任社长，热心社务，对全社学术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马寅初到了重庆，着手创办重庆大学商学院并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兼教授。他除培养经济理论和经济专业人才外，特别注重战时经济状况的研究。此时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营私和腐败，疾恶如仇，思想日益趋向进步。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要求抗战卫国，反对出卖民族利益；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要求稳定币值，反对通货膨胀。1939年，他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充实抗战经费。这样的提案在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当然是不可能通过的。但他并不气馁，继续进行演讲，并发表文章指出：“有几位大官，乘国之危，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之上。”“现在前方抗战，

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而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故欲实行资本税，先须自发国难财者之大官始。”他奋力向社会呼吁：必须从速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

马寅初要求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虽然是以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但是他的矛头所向，直指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因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此却惶恐万状，又恨又怕，先是以利禄引诱，高官收买，继而派特务的暗杀相威胁，这种种卑劣伎俩激起了正直爱国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无比愤怒。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然到处演讲。一次，他在重庆实验剧院演讲时，妻挈子女一并到场，以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他说：“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应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即因此牺牲也在所不惜”当被捕时，马寅初也曾严厉拒绝战区经济调查员的虚名，干脆地说：“流放就流放，何必名义？”马寅初此种仗义执言，刚直不阿，临难不惧，为争取言论思想自由而奋斗的勇气，为争取民族解放胜利而牺牲的精神，令全国人民佩奋，却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于1940年12月下令逮捕了这位不畏权势敢怒敢言的马寅初先生，先后把他投入息烽、上饶集中营。在社会舆论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于1942年8月不得不将马先生释放出狱，但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寓所达3年之久，直到1944年冬，才获得政治自由。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对战时的经济研究，处处以有利于抗战为目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先后发表了《非常时期之

财政问题》、《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纸币政策》等文章，对抗战时期的经济、财政、货币、物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抗战爆发后，发表过《提议对发国难财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实战后之复兴经费》、《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等60多篇论文，后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该书较详细的记录了马寅初战时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其主要经济思想有：

(1) 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的税收制度。马寅初认为30年代的财政制度，很不利于抗日。当时的关税、盐税、统税都是间接税，可以通过商人转嫁给贫民，增加了贫民的负担。一旦战争发生，海口被封锁，进出口贸易被阻，关税势必税减，盐税也成问题，统税也没有着落，唯有增发纸币，以应战费急需，则势必通货膨胀，物价猛涨，吃苦的还是贫民。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的多系贫民，而富有者不但不参战，反而让他们的存款、地皮、股票等免税。这不符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公平原则。所以现行税制非改不可。

(2) 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有人以为财政只要多发纸币，一切费用都有了，他认为，如靠发行纸币筹划战费，贫民损失重于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主张实行以所得税为中心的战费筹措政策，集中负担于富人。若以多发纸币为中心，则处处相反，使贫人负担过重。他还主张，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迫大亨们购买相当于其发横财数量的公债，并征收财产税，这样可以使法币稳定，金融市场活跃，物价也就自然平稳下来。

(3) 战时的货币问题。中日战争除了军事战争之外，还有“货币战争”。中国是不能加入日元集团的，否则，就会在政

治上、金融上都受其控制，等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三、抗日战争后的经济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此时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在经济上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官僚资本垄断，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竭力主张发展民族经济。

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怒潮，被迫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问题的协议。但是国民党政府只是作作样子，根本没有履行的诚意。2月10日，重庆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马寅初、郭沫若、施复亮等参加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了军警特务大打出手，造成了闻名中外的“较场口事件”。马寅初、郭沫若等都被打伤，马寅初额部受伤，马褂也被撕破。但他毫不屈服，未等伤愈，第二天又与重庆一些学校的学生进行座谈，发表自己对政局的一些意见。

1946年2月4日，他应邀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公开演讲，题目是：《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他在演讲中揭露那些丧心病狂的特权大官们取消新《公司法》中对他们限制的条文，以便勾结外商，大发横财。他坚决反对少数官僚操纵国防最高委员会，强行取消新《公司法》中对外商“营业”的限制。次日重庆《商务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马寅初的演讲消息，6日，重庆《民主报》又以《打倒官僚资本，热烈响应马老的呼吁》为题，发表了社论，表示支持马老的正义立场。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旧政协决议，破坏停战谈判，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潮。这年6月，国民党行政院当局，为了使运送武器的美国兵舰直接开到内河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决定“开放内河航行权”。消息传开，全国愤然。

6月13日下午，杭州20所大中学校近万名学生集会抗议。伪保安司令部事先通知，不准马寅初参加，但马寅初不仅来了，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中国为什么弄得这样糟？是因为有些人“贪污的贪污，做强盗的做强盗”，“官做的越大越贪污”。他深入浅出地说：人民没有饭吃，是物价太贵，通货膨胀，而根本原因在于内战，军费开支大。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内战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会后，年届65岁的马寅初冒雨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

马寅初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在“五四”以来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极大的影响，他们尊其为师长，是“楷模”。1946年5月，马寅初65岁寿辰之际，上海市经济学术文化团体联合会等18个单位，特意为他联合举行欢迎茶会，并在会上向马寅初献了“马首是瞻”四个大字的纪念锦旗，以示敬意。

总之，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集会请他讲演，马寅初不顾特务机关放出加害于他的流言，写下遗书，如约到会演讲。表现了一个民主战士的铮铮铁骨，鼓舞了青年们的斗争精神。

抗战后，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中

国经济问题决于政治》、《中国经济之路》等等。

1948年出版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是马寅初30多年研究财政、税收问题的重要成果之一，他除了阐述有关财政与税收的理论外，还介绍了英国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美国汉森的新公债哲学。他认为这些理论是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写的，不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他说：“如果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以之介绍于中国人民，不啻纸上谈兵，不切实际。”抗战胜利后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

(1)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在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倾销政策。认为官僚资本、封建买办与洋人勾结在一起，摧毁一切私营企业，这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旧路。他明确指出：“美货廉价倾销的目的，是打倒我国一切民族工业，决非所谓‘救济’。要使中国走上自由建设的道路，首先必须清除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2) 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马寅初说：“靠做官搜刮，或者利用国营本利而发财，就叫官僚资本。18年训政的结果，若干官僚们由穷光蛋而变作大富翁，财产象天文数字那么多得难以计算。”它们勾结帝国主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扼杀民族企业，因此，“为着我国不变成殖民地，必须打倒官僚资本”。同时，他还指出：要解决经济问题，要真正的从事生产，一定要国营民营一起来。不但轻工业可以民营，重工业也可以民营，这是中国经济民主